

信誉、财富与农村信贷配给

——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研究

朱喜¹, 马晓青², 史清华¹

(1.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52;

2.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要:文章使用2006年云南、宁夏近800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在区分农户的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的基础上,研究发现信用社和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偏向富有农户,民间借贷者没有这种偏向,因而其服务的覆盖面远远超过正式机构。两者都重视农户的信誉状况,但信用记录没有实现共享。这些行为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各类金融机构之间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差别。

关键词:农村金融;信贷配给;信誉;财富

中图分类号:F83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8-0004-12

一、引言

由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问题导致的严重信贷配给现象,是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一个不争的事实。许多研究指出,尽管农户对利率水平的高低并不是很敏感,而是更重视信贷的可得性,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正式金融机构)仍然不能很好地满足他们的信贷需求,对农户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等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史清华、陈凯,2002;李锐、朱喜,2007)。事实上,为了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我国政府自1996年起就启动了农村金融改革,至今已有十多年,最近又启动了新一轮的农信社改革。^①当前各类金融机构究竟是如何向农户提供贷款的?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户的信贷需求?了解这些问题对于确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

徐忠、程恩江(2004)利用宏观数据研究指出,20世纪90年代农村金融机构商业化改革后利率政策的扭曲造成了农村地区资金外流的后果。这种扭曲

收稿日期:2009-04-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0703023和70673065);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07EJB007);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502000_X90802)

作者简介:朱喜(1979—),男,上海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

马晓青(1965—),女,江苏盱眙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人员;

史清华(1964—),男,山西襄垣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也对农村金融机构行为及效率产生了影响,朱喜、李子奈(2006)和李锐、朱喜(2007)利用 2003 年全国 10 个省份农户贷款信息,采用结构模型同时估计农户的需求方程和金融机构的供给方程,发现政策、关系等因素对金融机构的供给影响很大。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缺乏对农户信贷配给状况的深入考察,而且很难对不同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其中主要的障碍在于:首先,数据获取非常困难。由于信用社、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向研究者提供分笔贷款的相关数据,而民间借贷者又高度分散,也很难收集相关数据;其次,农户信贷需求界定不够清晰。从理论上来说,信贷需求可以分为名义贷款需求(notional demand)和有效贷款需求(effective demand)两类,前者是指农户在无摩擦的完全信息世界中决策时所产生的需求,而后者是在有摩擦的真实世界中决策时所产生的需求。由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在农村金融市场十分重要,因此对两者不作区分很可能会造成误导性的结果。

通过在农户调查中对问卷的特别设计,本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无法直接从金融机构获取数据的困难,而且同时得到了农户的有效需求和名义需求的信息。我们采用直接启发法(Direct Elicitation Methodology)来界定农户的需求。直接启发法是目前国际上解决这类问题的两种流行方法之一,它通过问卷设计诱导农户显示出关于信贷需求的真实信息(Jappelli, 1990; Feder 等, 1990; Mushinski, 1999; Petrick, 2004);另一种方法是结构计量模型和动态投资模型方法,即对农户家庭建立经济模型或结构模型,刻画其在受到金融抑制时的行为特征,再通过实证检验这种特征是否存在(Kochar, 1997; Hubbard, 1998; 李锐、朱喜, 2007)。尽管直接启发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农户的主观判断,但依然能够较好地衡量金融抑制程度,其有效性逐渐得到认可(Boucher 等, 2006);而结构计量模型和动态投资模型虽然不依赖于主观判断,但对金融抑制的衡量相对粗糙,一般只能反映总体状况。

使用 2006 年在云南、宁夏两个西部省份近 800 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当前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的信贷供给行为。云南和宁夏在新一轮的信用社改革中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4 年采用了省级联社的模式,^②通过资产置换和机制改革,在服务三农、商业的可持续方面都改变了过去的落后面貌,取得了一定成效。^③因此,采用这两个省份作为调查地区,可以更好地观察欠发达地区这轮改革后的农村金融机构行为。

二、理论框架

(一)信贷配给模型

为了更好地说明各类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我们借鉴 Stiglitz 和 Weiss(1981)的模型以及 Conning 和 Udry(2007)的综述,使用一个相对简单的道德风险模型来分析信贷配给。^④假定农户是风险中性的,^⑤他有一个生产

项目,该项目需要投资 I ,但农户自己没有资金。如果农户得到贷款实施项目,就能够产生 x_s 的收入(s 代表真实世界的可能状态,假设 s 取 1 时为好的状态发生, s 取 0 时为差的状态发生)。发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在于,得到贷款之后农户可以选择 e^H (高)和 e^L (低)两种努力水平进行劳动,高的努力水平会导致更高的期望收入,即能够以更高的概率实现好的状态产出 x_1 (记这个概率为 p ,低努力水平实现 x_1 的概率记为 q ,则 $p > q$);但也会导致更多的效用损失(令 V 代表努力的机会成本,则 $V(e^H) > V(e^L)$,记机会成本的差值为 $B = V(e^H) - V(e^L)$)。而金融机构无法观察到这种努力水平,或者验证成本过高。这里还假定金融机构面临着完全竞争,因此只要得到保留收益即可,不妨设为 0;金融机构的资金供给是其收益的增函数。

首先考虑完全信息的情形,即金融机构能够观察到农户的努力水平,不存在交易成本。令 c_s 代表农户在不同状态下的收益, r 代表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 A 代表农户的可抵押资产,则最优合同可以描述如下:

$$\begin{aligned} & \max_{c_0, c_1} pc_1 + (1-p)c_0 \\ & \text{st } E(x_s - c_s | e^H) \geq I(1+r) \end{aligned} \quad (1)$$

即农户在参与约束(1)下最大化期望收益。在此问题下,最优状况下农户投资项目的收益总额为 $E(x_s | e^H) - I(1+r)$ 。因此,在完全信息下,所有有利可图的项目都会得到融资。只要农户具有能够提供正的期望收益的项目,使得约束(1)式得到满足,农户就希望得到资金 I ,即具有贷款的需求,此时我们称农户具有名义需求。

其次考虑信息不对称的情形。此时至少需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金融机构不能观察到农户的实际努力水平,为了给农户努力劳动提供激励,提高预期产出,需要模型中增加相应的激励相容约束;其次,当差的状态在现实中发生时,金融机构通常最多只能得到农户可抵押资产的上限(即有限责任),这可能会导致农户选择过高风险的项目,最终导致倒 U 型的供给曲线(Stiglitz 和 Weiss, 1981)。因此,最优合同为农户在参与约束(1)式、激励相容约束(2)式和有限责任约束(3)式下最大化期望收益:

$$pc_1 + (1-p)c_0 \geq qc_1 + (1-q)c_0 + B \quad (2)$$

$$c_0 \geq -A \quad (3)$$

由(2)式可得 $c_1 \geq c_0 + B/(p-q)$,其中 $B/(p-q)$ 被称为信息租金,即为了激励农户更加努力劳动需要付出的代价。可以证明,在此模型设定下,只有农户能够提供的可抵押资产 A 超过最低抵押要求

$$A = pB/(p-q) - (E(x_s | e^H) - I(1+r)) \quad (4)$$

时,金融机构才会愿意为农户提供贷款,此时的最优合同为 $c_0 = -A$, $c_1 = -A + B/(p-q)$ 。最低抵押要求与贷款规模 I 、金融机构的资金成本 r 、农户努力的机会成本都是递增关系;农户的投资项目期望收益越高,努力劳动时项目越

“安全”(即 p 相对于 q 越大),都会减少最低抵押要求。显然,引进信息不对称以后,可执行的合同数量大大减少,信贷配给随之发生。

如果再将农村金融市场的其他摩擦因素考虑进来,如信用社贷款中的隐含送礼成本、提供抵押资产需要的成本(如抵押标的物的登记、评估等)、民间借贷的面子成本等,将其统称为交易成本 F ,将使得参与约束(1)式变为:

$$E(x_s - c_s | e^H) \geq I(1+r) + F \quad (5)$$

则约束条件变得更为苛刻,可以执行的合同数量进一步减少。如果农户同时满足约束(2)式、(3)式和(5)式,即考虑到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后仍然具有贷款需求,我们就说其具有有效需求。

(二)相关讨论

1. 名义需求与有效需求。上述分析表明,农户的名义贷款需求是在完全信息世界中决策时所产生的,而实际贷款需求是在真实世界中决策时所产生的。两者存在明显的差异,某些农户可能具有正的名义需求,但考虑到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因素,其有效需求有可能为 0,即预先配给。

过去许多关于金融机构供给行为的研究,分析的是金融机构对向其自身提出贷款要求的农户的供给决策,这实质上是在研究有实际借贷需求的农户如何被配给;而事实上,研究有名义借贷需求的农户如何被配给可能更有意义(Mushinski,1999),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反映出由于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障碍,致使本来对社会有利的很多借贷交易在现实中没有实现。

2. 财富、信誉和贷款供给。上述模型可以用来分析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各类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拥有更好信息的金融机构,或者根据更好的信息进行事前筛选,或者使用较低的监督成本,都能够促使借款农户偷懒的机会成本 B 减少到 $b(b < B)$ 。根据最低抵押要求与偷懒机会成本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金融机构的信息成本越低,最低抵押要求越低,它就能够为更贫穷的农户提供服务。^⑥假定财富与提供抵押的能力成正比,可以得到命题 1。

命题 1:金融机构信息成本越高,在提供贷款时,对农户的财富越敏感。农户的财富越多,向其提供贷款的概率越大。

如果农户拥有的财富不够满足最低抵押要求,那么金融机构是否就会完全将其排除在贷款服务之外呢?借助于信誉机制,农村金融机构仍然可以有效地提供更多的服务。如果农户曾经在某个金融机构得到过贷款,并且及时归还,这种良好的信用记录就是关于该农户可靠程度(信用)的一个有利信号,说明农户事后偷懒或者违约的机会成本相对较低(在模型中也可以描述为 $b < B$)。农户如果因为一笔贷款交易的违约失去了声誉,其损失不仅仅是未来项目的融资机会,还包括面子、地位等社会资本。所以,金融机构从农户过去的信用记录中可以较好地推断其可靠程度。结合最低抵押要求的决定公式(5)可知,由于 $b < B$,有良好的信用记录的农户,其最低抵押要求就小($A(b)$)

$< A(B))$ ，于是得到第二个命题。

命题 2：与没有信用记录或记录不佳的农户相比，金融机构倾向于为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农户提供更多的贷款，即“越可靠”的人得到贷款的机会越大。

（三）实证模型设定

我们应用 probit 模型来分别研究不同金融机构对于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的贷款供给行为。令 y 为金融机构决定是否发放贷款给农户的两元选择变量， y 取 1 代表接受，取 0 代表拒绝， y^* 为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标准（可以看作信用评级，标准化为 0 以上为好，0 以下为差）， X 为财富、信誉等解释变量，代表可能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决策的因素，建立模型如下：

$$y^* = X\beta + \epsilon, y = 1[y^* > 0] \quad (6)$$

其中 $\epsilon|X \sim N(0, 1)$ 。模型的经济含义为，金融机构对有需求的农户的信用评级取决于各解释变量 X ，如果其评级是好的，就发放贷款；如果评级是差的，则拒绝贷款。模型(6)一般使用极大似然法(MLE)进行估计。考虑到正态分布假设在实际中不一定满足，我们放弃该假设，采用准极大似然法(QMLE)得到参数 β 的一致估计量，以保证结论的稳健性。

三、数据来源和基本事实

（一）信贷需求的度量

农户是否具有有效需求可以从他是否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反映出来，但名义需求则不然。在完全信息的世界里，一部分农户在当前的利率下是有需求的，但是考虑到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等因素，他们可能不会去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因此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具有有效需求的农户，另一部分是预先被配给的农户。显然，后者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因素对贷款交易的影响，因而是非常重要的。然而确定这部分农户也正是实证研究的难点。

直接启发法的具体应用如下：我们在问卷中依次设计了如下问题（以信用社为例）：（1）在 2006 年是否向信用社申请贷款？（2）如果申请过，是否得到贷款；（3）如果没有申请，原因在于_____。

第(3)个问题提供的选项如下：1)我不需要贷款；2)从其他渠道可以得到贷款；3)缺乏抵押或担保；4)申请也不会得到；5)利息太高；6)手续太麻烦；7)可贷数额太小；8)担心借了还不了；9)其他_____。

根据名义需求的定义，我们把选择 2)、4)、6)、7)以及 9)中回答“关系不够”的农户归为有名义需求的农户，这些因素都与农户的抵押、交易成本等相关，属于非价格因素；选择 5)的农户是由于价格因素不申请贷款，不属于配给的范围；选择 1)、2)的农户则显然对贷款没有兴趣；而选择 8)的农户其项目收益率可能不足以弥补利率成本，对贷款也没有兴趣。这些都被视为无名义需

求。将这些问题依次推及银行和民间借贷者，就可以得到农户对不同金融机构的名义需求、有效需求及其配给状况。

（二）样本调查与农户信贷需求状况

我们对云南、宁夏的近千个农户家庭进行了细致的专题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749 份，其中云南 369 份，宁夏 380 份。调查涵盖了农户在 2006 年的信贷、收入、消费、土地、房产等各个方面，尤其在信贷方面的详细信息。此次调查在两个省各选取两个县，其中云南是宣威和隆阳，宁夏是隆德和西吉，每个县各选 4—8 个村，每个村各选取 25—40 个农户家庭，并尽量包含各个收入层次的农户。整理出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状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样本农户的信贷需求（2006 年）

金融机构	有效需求	名义需求	供给	有效需求信贷配给程度(%) ^a	名义需求信贷配给程度(%) ^b
信用社	141	358	90	36.17	74.86
银行	50	258	14	72.00	94.57
民间借贷	308	364	271	12.01	25.55
平均	166	327	125	40.06	64.99

注：a 为 $(1 - \text{供给} / \text{有效需求}) \times 100\%$ ；b 为 $(1 - \text{供给} / \text{名义需求}) \times 100\%$ 。

从目前欠发达地区的三类金融机构来看，名义需求金融抑制程度（农户的名义需求被配给的比例）平均为 64.99%，反映出农户面临着严重的信贷配给问题。而我们的调查进一步显示有效需求配给程度（农户的有效需求被配给的比例）与名义需求配给程度存在差异。农户的名义需求发生频次平均为 327，近乎有效需求发生频次的两倍，这意味着将近一半的名义需求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等因素被预先配给了。被调查农户的名义需求信贷配给程度要比有效需求信贷配给程度高 50% 左右，显然，如果只考虑有效需求，将大大低估农户信贷需求被抑制的程度。

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对农户信贷需求的配给程度存在非常大的差异。首先看正式金融机构：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户正式信贷需求方面确实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对样本农户发放贷款 90 笔，有效需求满足率达到 63.83%；而以商业化为目标的银行显然没有动力为农户提供信贷服务，对样本农户发放贷款仅 14 笔，有效需求满足率仅为 28.00%。但不管是信用社还是银行，提供的信贷服务的覆盖率仍然非常低，两者的名义需求满足率分别仅为 25.14% 和 5.43%。特别是银行，看来基本已经放弃了农户信贷市场。

而民间借贷者事实上一直是满足农户信贷需求的主要支柱，对样本农户发放贷款 271 笔，达到正式贷款总和的 2.61 倍，有效需求满足率为 87.99%，名义需求满足率达到 74.45%，远远高于信用社和银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民间信贷者而言，农户的名义需求和有效需求发生频次的差异只有 18.18%，而信用社和银行的差异分别为 153.90% 和 416.00%，充分表明民间

信贷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要远远低于信用社和银行,在信息、监督、便利等方面具有正式机构无可比拟的优势。

四、金融机构供给行为的实证结果

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供给行为,我们分别对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建立 probit 模型。对各类金融机构,在回归中使用的样本为对其具有名义需求的农户。如果只使用具有有效需求的样本农户来做回归,由于没有包含一部分因为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而自动退出的农户,很可能会低估农村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程度,实证结果也支持了这一点。^⑦

被解释变量设定为该金融机构是否对农户提供贷款服务,若是取 1,否则取 0。主要解释变量包括农户的土地(land)、财富、信誉、是否干部户(ardre)、年龄(age)、教育水平(edu)、性别(male)以及代表云南的地区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农户的家庭住房面积(house)作为其财富的代表变量。中国农民对于大房子有着非常强烈的偏好,拥有宽敞明亮的住房被视为财富的象征,因此住房面积是一个较好的显示农户财富水平的指标;使用农户以往在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的成功信贷经验(recordf1,recordf2 和 recordinf)分布代表其在对应的金融机构的信誉。如果农户在过去几年中得到贷款并如期归还,可以作为该农户具有较好信用的一个信号;为控制不同地区经济、文化等差异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代表云南地区的虚拟变量。

表 3 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模型估计

解释变量	信用社		银行		民间借贷者	
	参数	稳健 t	参数	稳健 t	参数	稳健 t
land	-0.0023	-0.1452	-0.0313	-1.0145	-0.0003	-0.0205
house	0.0051	3.9052	0.0041	2.1513	0.0001	0.0377
recordf1	1.5040	6.2448				
recordf2			1.5108	1.9568		
recordinf					1.3039	7.0454
ardre	0.8395	2.3213			0.2387	0.6148
Age	-0.1015	-2.0242	-0.0268	-0.3409	-0.0347	-0.6526
agesq	0.0010	1.7787	0.0005	0.6131	0.0001	0.1624
edu	0.2105	2.0504	0.0922	0.4859	0.1197	1.2315
male	0.4273	1.4627			0.2921	1.1470
yn	0.1583	0.5887	-0.9873	-2.2155	-0.0253	-0.1014
_cons	-0.1554	-0.1288	-1.6081	-0.7094	0.8652	0.6988
obs		358		258		364
log-likelihood		-159.6257		-44.9886		-159.2158

注:(1)使用准极大似然法(QMLE)方法估计参数。

(2)银行供给模型中略去干部和性别变量,是为了控制多重共线性的影响。

表 3 列出了信贷供给模型的估计结果,与前文分析的主要理论命题基本

相符。显然，欠发达地区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对农户的供给行为存在根本差异。

首先看信用社。农户信用记录变量的参数估计值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信誉会显著提高农户的真实需求得到满足的概率。根据 probit 模型的边际影响估计方法 (Wooldridge, 2003)，可以估算出在其他控制变量相同 (取平均值) 的前提下，在信用社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农户与没有这种信用记录的农户相比，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要高 53.74%。^⑧ 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表明农户信誉是信用社进行贷款决策非常重要的参考依据。财富变量的参数估计值与理论预期相同，同样显著为正，表明信用社在提供贷款服务时，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向富有农户的倾向。样本农户住房平均面积在 125 平方米左右，一个住房面积为 40 平方米的农户 (即面积减少一个标准差)，相比平均农户而言得到贷款的概率要低 12.75% 左右。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信用社贷款来说，在其他情况等同的前提下，信誉效应似乎要比财富效应显著一些。作为干部的农户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比非干部农户显著高得多。从农户角度来看，这有些不公平，但是从信用社保证贷款安全性的出发点来看，偏向他们也是自然的反应。由于村干部往往与信用社打交道比较多，双方都掌握对方较多的信息，贷款偿还也比较可靠。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干部户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比非干部户要高 30.25%，可见“干部评级”也是信用社较常用的贷款策略。农户的个人特征也会影响信用的贷款决策，教育水平越高，年纪越轻，得到信用社贷款的概率就越高，表明信用社相对关注农户的潜在还款能力。由此可见，在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激励下，信用社的经营方式看来接近于商业化原则，它所关注的主要变量如信誉、财富、教育等，与信用社最大化利润假设下的理论预期结论是一致的。贫困的农户将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但由于缺乏历史数据的对比，我们尚不清楚这一转变对其服务的覆盖面将产生多大的影响。

银行对农户的信誉和财富水平都比较敏感，其中信用记录的平均边际影响为 33.81% (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略低于信用社。但银行对农户是否为干部户并不敏感，这可能是由于作为商业银行在农村基层的分支机构，他们与村政府打交道的机会不多，因此不会与村干部形成关系或者了解其信息。此外，银行对农户的其他个人特征变量如教育、年龄等也不敏感，可能的原因是银行并没有把向农户提供贷款真正作为自己的经营方向，而且在信息成本方面也较信用社更高，因此没有激励去了解或评估农户的信用状况。

农户土地面积的增加不会提高信用社或银行向其提供贷款的概率，这与国外许多研究结果所指出的土地会增加获得贷款的机会 (Kochar, 1997) 不同，但却体现了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所有制的重要事实。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集体的，农户只拥有长期的使用权，土地不具备抵押或者转让的功能。尽管近

年来政府出台政策,允许土地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流转,但在土地市场发育不完全和农业土地收益低下的情况下,它对抵押权的强化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民间借贷者在提供贷款方面显然要灵活得多。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农户的财富水平、地位(是否干部户)、教育水平、年龄等因素都不会显著影响其得到贷款的概率。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这正是民间借贷者对农户天然的信息优势和极低的交易成本导致的。民间借贷者多数为农户的亲友或同村(乡),对农户的了解和熟悉程度很高。熟悉农户的贷款者不但可以在事前轻易地筛选农户的类型,而且可以使用较低的成本在事后对农户的贷款使用情况实施有效的积极监督(如社会压力等),此外,与同在一个社区的熟人交易起来也非常简便。那么民间借贷者究竟重视什么呢?我们认为是信誉。有良好信誉的农户更容易得到民间借贷者的青睐,在其他条件等同的前提下,其得到贷款的概率比没有良好信誉的农户高 36.05%。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市场的运行主要依赖于信息成本优势、交易成本优势,结合民间借贷(样本中高利贷的发生不多)的活跃交易来看,至少在目前,这个市场承担了满足欠发达地区样本农户贷款需求的主要任务。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民间借贷的信息优势、交易成本优势来源于相对集中的社区或网络,其覆盖范围不可能很大,而且容易受到同质性风险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信誉在目前欠发达地区的农村金融市场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不论是信用社、银行,还是民间借贷者,都对其非常重视,从调查农户来看,目前有信用记录的农户并不多,三者分别仅有 71 个、15 个和 266 个。那么,金融机构是否有效利用了这些已有的信用记录呢?我们在表 3 中各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模型中增加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记录进行估计,然后使用 Wald 检验来看某个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是否会受到农户在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记录的影响。对于信用社、银行和民间借贷者,Wald 统计量的 p 值分别为 0.5719、0.8555 和 0.8326,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表明信用记录提供的信息在不同金融机构获得共享。正式金融机构的信贷记录彼此之间没有得到利用,也没有被民间借贷者利用,这是一种信息的浪费,可能与农村缺乏征信体系有关。

五、结 论

本文使用云南、宁夏近 800 个农户家庭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欠发达地区不同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行为。研究发现,当前信用社的经营方式越来越接近商业化原则,尚不清楚这种变化是否影响其服务的覆盖面。较高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导致大量农户被正式金融机构预先配给。信用社是农村正式金融的主力军,在发放贷款时,优先考虑信誉较好、关系较密切、财富水平较高、教育层次较高的农户;而银行缺乏服务农户的积极性,在发放贷款时,比

较重视农户的信誉和财富水平；民间借贷者则比较重视农户的信誉，对财富、教育水平等不敏感，因而服务的覆盖面最广，目前是农户信贷需求的主要满足者。造成不同金融机构供给行为的这种显著差异的根源，在于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不同。尽管信誉对所有农村金融机构都很重要，但农户的信用记录在不同金融机构之间难以共享。

本文没有考察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浮动范围对其放贷行为的影响。按照我国政府的农村金融政策，信用社等正式机构的贷款浮动区间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由于该区间的利率上限相对于市场利率是较低的，很可能导致其提供贷款的收益不足以弥补成本，因而不愿意提供贷款。由于本文的实证是从农户角度研究金融机构的信贷配给，对于给定的金融机构（如银行），其在面对不同农户时所受到的利率管制是相同的，所以在设定实证模型时可以不考虑这个因素，但同时也无法具体界定该因素的影响。弥补这个缺憾的途径之一是收集来自农村金融机构的数据，这一点有待未来的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在新的农村金融改革强调财务可持续性的背景下，应当尤其重视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保证农户的名义信贷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政府应当尽快建立和完善统一的农村征信体系，为广大农户建立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平台，给各类金融机构提供农户的相关信息，增加农户得到贷款的机会。另外，可以考虑为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可能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非正式金融机构在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优势，而正式金融机构在资金来源和对称异质性风险方面具有优势，找到合适的方式进行合作，可以促使更多的农户获得有效的服务。^⑨

注释：

- ①新一轮改革以提高服务覆盖面和财务可持续性为目标，通过央行发行专项票据为农信社改革提供资金支持，将票据支付与农信社改革效果挂钩，对机制改革形成了较强的激励，被称为“花钱买机制”。
- ②其中宁夏农村信用社实施自治区联社和县市联社两级法人管理体制。
- ③2006年存、贷款余额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分别实现4.3亿元和6.5亿元的经营利润。
- ④道德风险模型描述的情形比较适合生产性贷款（如农户购买化肥、拖拉机等生产资料等），与消费性贷款（如农户建房，购买生活耐用品等）略有差别。后者用逆向选择模型可能更合适，但结论和含义非常类似。为节约篇幅，我们只采用道德风险模型描述。
- ⑤这个假定将忽略农户贷款的保险功能，但这一简化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
- ⑥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减少了最低抵押要求，相应的隐含贷款利率会提高。参见Conning和Udry(2007)。
- ⑦采用具有有效需求的农户进行回归的结果发现，对信用社和银行而言，信誉因素并不显著。
- ⑧对于一般的连续解释变量，记为 x_1 ，其边际影响的计算方法为 $\partial P(y=1|X)/\partial x_1 =$

$g(\widehat{X\beta})\widehat{\beta}_1, \bar{X}$ 表示对所有解释变量取均值;离散变量的处理类似。

⑨印度国有开发银行(NABARD)与非正式农户互助组(SHG)的合作就是一个例子。

参考文献:

- [1]史清华,陈凯.欠发达地区农户借贷行为的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29—35.
- [2]朱喜,李子奈.农村正式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配给[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3):37—49.
- [3]李锐,朱喜.农户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2007,(2):146—155.
- [4]黄祖辉,刘西川,程恩江.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生产性抑或消费性——方法比较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07,(3):73—80.
- [5]徐忠,程恩江.利率政策、农村金融机构行为与农村信贷短缺[J].金融研究,2004,(12):34—44.
- [6]Boucher S R, Guirking C, Trivelli C. Direct elicitation of credit constraints: Conceptual and practical issues with an empirical application[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Working Paper, 2006.
- [7]Conning J, Udry C.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A]. R Evenson, P Pinga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Farmers, farm production and farm markets[C].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2007:2857—2908.
- [8]Feder G, Lau L, Lin J, Luo X.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 and productivity in Chinese agriculture: A microeconomic model of disequilibrium[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0,72(5):1151—1157.
- [9]Hubbard R G. Capital-market imperfections and investment[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8, 36(1):193—225.
- [10]Jappelli. Who is credit constrained in the U.S. economy[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0, 105(1):219—234.
- [11]Kochar, Anjini.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rationing constraints in rural credit markets in indi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7, 53:339—371.
- [12]Mushinski D. An analysis of loan offer functions of banks and credit unions in guatemal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36(2):88—112.
- [13]Petrick, Martin. Farm investment, credit rationing, and governmentally promoted credit access in poland: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J]. Food Policy, 2004, 29:275—294.
- [14]Stiglitz J E, Weiss A.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71:393—411.
- [15]Wooldridge J M.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A modern approach[M]. South-Western College Pub., 2003.

(下转第 36 页)

factors as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deepening and capital flow, and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he above factors on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 through the empirical test of ECM.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 is due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growth rates of Asian emerging countries and USA and the asymmetric financial markets. The key to resolving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 is to change the supply and demand relationship of current assets portfolio, and decrease the demand of dollar-assets reverse of Asian emerging countries. And dollar depreciation could not change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 into global economic balance.

Key words: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 current account; real interest rate; economic growth; financial deepening (责任编辑 喜 雯)

(上接第 14 页)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Reputation, Wealth and Rural Credit Rationing: Study on the Supply Behavior of Different Rur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 Less-developed Areas

ZHU Xi¹, MA Xiao-qing², SHI Qing-hua¹

(1.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52, China; 2. Center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about 800 rural households in Yunnan province and Ningxia province in 2006,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redit supply behavior of rur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in less-developed areas. By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notional demand and effective demand, it indicates that rural cooperatives and banks favor the rich rural households. But inform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do not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poor rural households and rich ones, so they cover more areas than form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Both of formal and inform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attach the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reputation of rural households, but the credit record is not shared. These difference stems from different information costs and transaction costs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Key words: rural finance; credit rationing; reputation; wealth (责任编辑 喜 雯)